

国际秩序转型、全球化反思与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外部约束^{*}

刘洪钟 杨攻研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进入了漫长的大衰退和大转型时代。以中美贸易战为标志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的博弈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所导致的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裂痕，深刻反映了这一转型进程的艰难。国际秩序的衰退与转型缘起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兴衰交替，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的逆转，以及多边主义进程的停滞。展望未来，国际秩序转型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西方国家日益加剧的右翼民粹主义将成为该时期的核心变量。右翼民粹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扩张、全球化迅猛发展和技术急剧变化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同时发达国家国内政策未能及时调整而导致的恶果；然而，在非理性选举政治和所谓公平贸易的鼓噪下，经济全球化不幸成了一切问题的根源和替罪羊。在此背景下，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推动者，中国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努力保持本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需要高度重视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与新兴国家及发达国家携手共同推动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以最终实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国际秩序转型 全球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新一轮开放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全球经济政治秩序进入剧烈的震荡期。2018年由美方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在把双边经贸关系推向“脱钩”边缘的同时，还对全球经济形成巨大冲击。2020年3月以来在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污名化的行为更是加剧了国际政治

刘洪钟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特聘教授；杨攻研（通讯作者）系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教授，Email: ygy85@163.com。

^{*}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引领东亚区域分工体系调整研究”（项目编号：18BJL111）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经济形势的紧张气氛。中美经贸摩擦以及因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扩大的分歧，就是当今紧张、动荡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缩影。在未来数年中，各国都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做出艰难的政策选择。是如特朗普般不断走向孤立主义并选择与他国对抗，还是携手合作以克服横亘在各国面前的种种难题，将决定全球能否重现繁荣与和平。

中美经贸摩擦既是双边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多边问题。就对抗的主体而言，中美经贸摩擦是中美两国长期矛盾激化的结果，特朗普政府无非是借助国内民粹主义的高涨把这种矛盾变成了公开的“贸易战”^[1]。然而，在这场纷争中，其他西方国家普遍抱持的隔岸观火的心态又凸显其所具有的多边性质。一方面，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美国同样存在经贸领域的分歧，同时在国际事务中对美国单边主义行为颇有微词，加之中国庞大国内市场的吸引力，这些国家仍然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希望中美经贸摩擦能够尽快平息，以免本国经济遭受波及。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伴随中国国际（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欧洲许多国家也因经济空间受到挤压而略感焦虑。它们普遍认为中国非市场化和不透明的政策支持推动了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快速增强，而这种做法对于西方国家和企业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它们对美国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甚至在某些西方媒体看来，特朗普采取了其他国家想做而未敢尝试的行动。^[2]

2020年初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增加了欧美各国对中国的疑虑和担忧。除了指责中国瞒报疫情信息外，一些西方国家官员和媒体还在美国挑唆之下指责中国在这场全人类的灾难中，通过对世界各地的援助行动彰显制度优势、扩大自身影响力。此外，全球价值链体系下对中国生产的高度依赖也成为这些国家诟病的对象，它们誓言疫情之后一定要重建本国生产体系。疫情冲击之下跨国公司迫于政治压力和商业逻辑而进行供应链的重组也并非绝无可能，已经形成的全球价值链面临着加速分裂和调整的风险，欧美发达国家种种“去中国化”的尝试可能迫使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的地位和角色在疫情之后出现较大的变化。^[3]上

[1] 卢峰、李双双：“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转变与两国贸易战风险上升”，《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3期，第64~86页。

[2] Daniel, G., “Trump’s Trade War May Benefit Most Global Economies”, *The Business Times*, October 11, 2018; Josef, U., “在贸易冲突中我们应该为特朗普加油”，《新闻报》，2019年11月2日，转引自雨涵：“德语媒体：中美相争，欧洲该给谁加油”，德国之声中文网，2019年11月5日。

[3] 相关讨论与分析请参见佟家栋、盛斌、蒋殿春、严兵、戴金平、刘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及对中国的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3期，第9~28页。

述种种乱象之下，许多国际问题专家都断言：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格局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

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指出，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回顾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全面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在全球产业链上分工地位的持续攀升。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却在新自由主义达到鼎盛时期的20世纪90年代逐渐迷失，并自认为找到了永久性根除金融危机的良方，正如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所说，“在大衰退的问题上我们问心有愧，我们不会再次犯错了”。^[1]但正是这种自满导致了国内政策在金融、劳动市场等诸多领域的失败，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民众整体福利水平不断下降，金融资本日渐膨胀并最终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所谓的“新常态”，各类问题不断累积，全球金融危机逐步开始向社会领域蔓延，并在全球范围发酵和传染，最终引发了人们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强烈质疑和反对。美国特朗普大选的胜出、英国脱欧以及欧洲右翼政党的崛起标志着发达国家的社会危机正在进入一个不可控阶段，势将重塑各国国内乃至国际政治生态，全球由此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2]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更是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之下，不禁令人追问这一变局深层次的驱动因素是什么，五年、十年抑或二十年后又将身在何处，在这不确定的时代中国又当如何选择。本文希望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

国际秩序的瓦解与重构：从“大缓和”到“大转型”

（一）国际秩序从“大缓和”走向“大转型”

回溯历史，“大转型”的根源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分化而导致的各种矛盾的积累。学者们通常用“大缓和”来形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7年这段时期全球经济的典型

[1][美] 米尔顿·弗里德曼、[美] 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著，雨珂译：《大衰退1929—1933》，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页。

[2] 张宇燕从大国实力对比变化、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并伴随众多不确定性、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人口结构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演化、多边体系瓦解与重建、美国内部制度颓势显露和中美博弈加剧等八个维度对百年变局的理解做了更全面的解读。参见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第9~19页。

特征：发达国家高增长、低通胀、低波动，经济危机基本发生在外围国家。^[1]与之对应，这一时期的国际秩序也呈现“大缓和”的特点。尽管爆发了南斯拉夫战争、“9·11”恐怖袭击和伊拉克战争等，但冷战的结束也开启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安全期。该时期国际秩序具有两大特征：一方面，就国际政治秩序而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国际权力结构，即美国主导下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主要大国之间双边政治关系低波动。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逐渐走出冷战阴霾。这一时期，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发展但总体实力难与美国抗衡，新兴大国国际地位开始爬升但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一超多强的霸权结构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金字塔型的国际体系，大国关系呈良好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就国际经济秩序而言，各国经济发展理念不断趋同，自由市场理念深入人心，区域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国际经济合作进展顺利。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全球化成为各国发展经济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欧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冷战结束、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而进入鼎盛时期，东亚、拉美及中东欧转型国家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为新自由主义所裹挟而加入到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华盛顿共识”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良药”，各国经济理念上的分歧大大缩小，围绕经济政策的角力不再成为大国间的困扰。从冷战结束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尽管其间也出现了诸如东亚金融危机、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但总体上看，这一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财富积累速度历史罕见，足可媲美20世纪20年代的“奔腾时代”以及50-60年代的“黄金二十年”。

然而，国际秩序的“大缓和”进程在2008年戛然而止。破坏力仅次于大萧条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2008年注定成为国际秩序重构的元年。危机在对

[1] “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斯托克和沃特森（James Stock and Mark Watson）在2002年提出，并随着2004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演讲而引发关注，主要用以形容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前这一时期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特征。其主要内涵是经济增长波动和通货膨胀波动的同时下降，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在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同时还摆脱了经济大幅波动的困扰。根据布兰查德和西蒙（Olivier Blanchard and John Simon）的一项研究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季度实际产出增长的波动性（以其标准偏差衡量）下降了一半，而季度通胀的波动性则下降了约2/3。除了日本，其他主要工业国的产出波动率和通胀波动率也出现了类似的下降。对于大缓和产生的原因，伯南克总结出了三种解释：结构性变化、宏观经济政策改善和纯粹的好运气。参见Bernanke, B., “The Great Moderation”, Speech before 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Washington, February 20, 2004; James, S. and Mark W., “Has the Business Cycle Changed and Why?”,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7: 159-218, 2002; Blanchard, O. and John S., “The Long and Large Decline in U.S. Output Volatility”,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pp.135-164, 2001.

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内部富人(资本)和穷人(劳动)之间的失衡以极具破坏性的形式充分地展现出来,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接踵而至。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用全球化危机和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共振而导致的大衰退来描述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政治经济的形态。^[1]在他看来,这一时期与卡尔·波兰尼所描述的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向20世纪初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型”具有惊人相似的特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社会基本价值(充分就业、摆脱贫困、社会安全等)与自发调节市场经济之间出现断裂等。国际秩序也由此进入了另一次“大转型”时代,诸多领域的变化将对国际秩序的变迁产生深远的影响。^[2]

与此同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加速这一转型进程。疫情在全球范围内除了造成各国巨大的死亡人数,同时也导致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突然“停摆”,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更令人担忧的是,在疫情应对过程中,全球化时代市场力量所形成的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成为西方国家政客抨击的对象,而美国不但不再愿意承担传统的全球领导角色,而且对其他国家和多边国际组织横加指责,严重破坏了国家间的信任,各国不断加深的裂痕导致疫情应对的国际合作困难重重。毫无疑问,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世界秩序重构的强力催化剂,为世界秩序的转型提供了额外的动能,并使其沿着原有的趋势加速向前。

(二) 国际秩序进入历史“大转型”的主要驱动力

第一,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兴衰交替。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

[1][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孙柏等译:《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页。

[2] 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他1944年问世的经典著作《大转型》中对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转型进程,包括国际均势体系的打破、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经济自由主义弊端的不断显现及其对各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等产生的深刻而长远的冲击,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讨论。本文借用卡尔·波兰尼所使用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这一概念来描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秩序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其主要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新型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兴衰交替,引发国际政治秩序从单极霸权向多极竞合、国际经济秩序从西方主导向各方平等的转变;二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经济失衡与国内经济失衡交织共振而引发的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民众观念和意识形态由自由向保守、由开放向封闭的转变,社会的反向运动在各个领域涌现,开始重塑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形态。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变化并不代表国际秩序转型的最终结果,而是体现为动态的变化过程,“大转型”蕴含了对“大缓和”时代结束到新的国际秩序转型建立之前这段时期的各种症候的表述。简单说,当今所处的时代与卡尔·波兰尼所描述的历史上的“大转型”时期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未来国际秩序究竟向何方演化,仍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也正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担心所在。

总是不断变化，主要源于各国国力此消彼长、科学技术的新突破及组织形式的变革。^[1] 根据乔治·莫德尔斯基的研究，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政治中先后出现过四个领导者，分别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以及20世纪的美国，上述国家具有压倒性的洲际“权势投射能力”并制定了世界政治基本规范。^[2] 20世纪末以来，世界开始步入另一次的大国交替时代。一方面，中美两国相对国力的变化正朝着有利于中国的一方发展。另一方面，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中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的占比不断提升，从1990年的21.8%上升至2018年的40%，几乎提高了一倍；同期发达国家的占比则从78.2%下降至60%，二者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此外，仅看中国，每年为全球GDP增速的贡献率就超过了30%。新兴国家相对实力的不断上升必将对全球秩序产生重要的影响，全球治理模式能否适应国际新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国际秩序的转型能否平稳推进。

第二，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全球化遭受重大挫折。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齐头并进。1980—1981年间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秉承顺周期性的经济理念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沉重打击了国内传统产业，并使工人阶级原子化以瓦解工会的有效性，在信息技术革命助推下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得以高歌猛进。然而，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并未能够实现其思想理论鼻祖米塞斯、哈耶克及其衣钵传承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宣称的带来普遍繁荣的美好愿望。相反，在自由理念和逐利资本的席卷之下，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转变：如制造业离岸外包、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政府规模的缩减、公共服务私有化以及日常生活的金融化等。^[3] 这些结构性变化在使资本大攫其利的同时，也逐渐摧毁了工人和其他劳动阶层舒适而体面的中产生活。按照汉斯彼得·克里西的说法，全球化所造成的分类将获益者和失意者截然分离开来，“全球化的获益者可能包括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家和相关部门的合格雇员，还有世界公民。相反，全球化的失意者则是传统上受保护部门的企业家和合格雇员、所有的低技术员工，还有对自己的国家有着强烈认同的公民”。^[4]

[1][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国际文化传播公司，2006年，第35页。

[2]王之明：“最后的大国”，载于[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国际文化传播公司，2006年。

[3][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孙柏等译：《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0~151页。

[4][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孙柏等译：《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1页。

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撕裂的社会也为全面社会危机埋下了伏笔，最终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冲击下，西方世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双重危机”。从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到2015年之后不断出现的“黑天鹅事件”（如欧洲右翼力量的崛起、英国脱欧），再到2016年的美国特朗普当选，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不断遭受各类“反向运动”（Countermovement）的冲击，新自由主义的信条几近破产，全球化满目疮痍。

第三，多边主义严重受阻。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其同僚决心创建一种既能提升美国自身财富和权势又能将其价值观推展到世界任何角落的国际秩序。最终，他们选择了一种对于战后全球秩序重构来说意义非凡的制度形式，即“在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间协调国家政策的实践活动”的多边主义。^[1]这套国际制度体系涵盖了包括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在内的几乎所有领域，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成为该体系的支柱，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与繁荣、国家间的合作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冷战结束后，尽管美国的单极霸权达到了顶峰，但在多边主义已成为全球治理基本范式的背景下，美国的霸权外交仍会受到一定的掣肘和约束，这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试图行使单边主义的国家而言都是一种显著的制衡。

然而，随着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深刻演变，多边主义基础开始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步履维艰，难以真实地反映国际政治和经济权力此消彼长的变化。比如，2001年已经开始启动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如今已陷入困境；IMF改革亦是步履艰难。另一方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崛起极大动摇了多边治理体系的根基。美国是战后多边主义得以稳定发展的最重要基石，尽管基于寻求霸权利益的需要美国常常采取“菜单式多边主义”^[2]的不道德行动，但大体来看美国并未谋求退出多边主义的全球治

[1] 马昌乐：“冷战后美国多边主义刍议”，《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第170~181页。

[2] “菜单式多边主义”（à la carte multilateralism）最早由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司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提出，旨在说明小布什时期美国政府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其具体表现是，布什政府通常优先选择单边行动，但在单边行动不可能或不明智的情况下，也不排除按其意愿采取多边主义方式，选择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不过，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East-West Center）认为，美国内部的争论与其说是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选择问题，不如说是机制化多边主义和菜单式多边主义的选择问题。参见王联合：“美国单边主义：传统、历史与现实的透视”，《国际观察》，2006年第5期，第50页。East-West Center, “Asia Pacific Security: Dilemmas of Dominance, Challenges to Community”, SENIOR POLICY SEMINAR 2003, 2004。

理制度安排。然而，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在“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之下，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伊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等十多个组织或协定，甚至扬言退出WTO和联合国。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继续无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全球治理置于困境之中。当前美国的政策已经成为多边主义维系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并在国际范围内产生了诸多溢出效应，如英国脱欧、日本退出捕鲸委员会、卡塔尔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等。

（三）“大转型”时期的核心问题：民粹主义的兴起

处于“大转型”时期的国际秩序，各种矛盾和问题交织在一起，衍生出了许多被葛兰西称之为“五花八门的病理学现象”的复杂问题。^[1]在动态转型的过程中，民粹主义无疑是其中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新的国际秩序建立之前最亟待解决但又最为棘手的问题。

民粹主义的本质与表现。“民粹主义”一词起源于19世纪末，其时在美国由农民、工人和矿工形成的联盟，他们共同反对金本位制和东北银行及金融机构。当今的民粹主义则涉及广泛的政治运动，包括欧洲的反欧元和反移民政党，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美国的特朗普反贸易本土主义，拉丁美洲的查韦斯经济民粹主义，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民粹主义，具有一种共同的特征，即所谓的反建制倾向。他们声称是人民的代言人，反对精英，反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全球化，也常常显示出对专制极权治理的偏好。^[2]

民粹主义最重要的两种形式是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通常主要强调文化分裂，民族、宗教或人民的文化身份，并据此反对外部团体，认为他们对民意构成了威胁。此类民粹主义主要存在于欧洲和美国。在欧洲，他们将穆斯林移民、少数民族（吉普赛人或犹太人）等描绘成“其他人”；在美国，特朗普则多次妖魔化墨西哥人、中国人和穆斯林。左翼民粹主义则通常是因经济分裂而产生，主要体现为富有群体（少数精英阶层）与低收入群体（多数平民阶层）的区分，大多存在于拉丁美洲，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也开始泛滥。在拉美，低收入群体主要是受到了快速的贸易开放、金融危机以及跨国公司进入国内

[1] [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孙柏等译：《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56页。

[2] Rodrik, D.,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559, 2017.

敏感行业（如采矿业或公共事业）的巨大冲击，他们动员起来针对这些力量以及国内支持团体进行抗争。在美国，则主要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日益加剧的收入分配失衡，国内的中产阶级规模越来越小，哑铃型社会结构逐渐向金字塔型结构演变，最终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借由反对政府挽救危机的始作俑者——大金融机构而迅速掀起高潮，最终转化为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民粹主义的根源。日益加剧的民粹主义，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技术变化和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发达国家国内政策没能及时进行适应性调整，从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下各类问题集中爆发而产生的结果。以鼓吹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给各国带来的是范围不断扩展的私有化、劳动力市场管制的解除、工人社会保护措施消失、对土地资源的侵占以及金融资本市场的全面放开等。与此同时，以网络和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急速拉近了国家之间的心理距离。新自由主义和技术进步的结合，使得金融资本席卷全球且赢者通吃。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鼓吹者坚信，通过所谓涓流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中的渗透效应，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会从增长中受益。但这一结论根本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1]21世纪以来广泛存在的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发展再次证明，被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浪潮裹挟并被抛弃的广大劳动者阶层逐渐“成为自己国家的陌生人”。正如齐格蒙·鲍曼所言，“曾几何时，人们认为未来意味着更为舒适和快捷，可现如今，人们视这个想法为可怕的威胁，担心自己会被鉴定、归类为既没有能力也不适合担当未来之重任者，丢失价值和尊严，由此被边缘化、被排斥、被遗弃”。^[2] 罗伯特·帕特南、J. D. 万斯和罗伯特·卡普兰等三位作者从不同角度对美国贫富差距扩大及阶层分化问题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更加深刻

[1][匈牙利]卡尔·波兰尼著，刘阳、冯钢译：《大转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2][英]齐格蒙·鲍曼：“寻找目标与命名的症状”，载于[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孙柏等译：《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3页。

地理解民粹主义为何能在美国蔓延以及特朗普何以当选总统。^[1]因此,虽然从根本上说民粹主义兴起是由于发达国家国内政策的失败所致,但其背后确实也反映了技术进步、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重大缺陷。这些因素在推动国际秩序进入历史性转型的同时,也催生了象征世界失序的民粹主义,两者相伴而生,并行前进,使得人们愈发难以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

全球化反思与国际秩序转型的未来

如上所述,全球化是导致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原因,但并非唯一决定因素。根据罗德里克的分析,以自动化和新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在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和收入不平等问题上更具解释力。^[2]但从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攻击的对象看,他们并未把矛头指向技术进步,而是集中于经济全球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助推了国家之间以及各国内部的双重失衡;另一方面,相比新自由主义和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更容易被塑造成被攻击的对象。

(一) 全球经济失衡与国内经济失衡交织并产生共振

杰弗里·弗里登如是说:“全球化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个事实”。^[3]他观察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发现现代许多人所认为的全球化是必然的和不可

[1] 曾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和案例事实分析了当今美国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寒门子弟上升通道几乎关闭、阶级鸿沟不断扩大,20世纪初的美国梦几乎化为泡影的现象。参见[美]罗伯特·D.帕特南著,田雷、宋昕译:《我们的孩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

担任投资公司高级管理者的万斯,以个人的亲身经历真实讲述了美国社会、地区和阶层衰落会给一生下来就深陷其中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万斯是一名幸运儿,从一个充满着药物滥用、酗酒、贫穷和精神创伤的底层白人蓝领家族中冲了出来,最终成了一名投资公司的高级管理者。但他的成功对于底层的美国白人蓝领来说,实在是屈指可数,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摆脱不了世袭的贫穷与困顿,生而贫穷“就如原罪一般,终身困扰着当地人”。参见[美]万斯著,刘晓同、庄逸抒译:《乡下人的悲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

美国著名地缘政治专家罗伯特·卡普兰通过自己从美国中部的圣路易斯到西部的波特兰,从北部的加拿大边境到南部的墨西哥边境的旅行考察,探讨了美国如何在种族、阶层、教育、地理上充满了区隔和断裂这一现象。在作者的眼里,美国财富在迅速增加,但贫富差距也在拉大;传统的信念已经逝去,而新的信念仅仅处于萌芽状态。作者最终认为,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进入了一个高度未知的阶段。参见[美]罗伯特·D.卡普兰著,何泳杉译:《荒野帝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

[2] Rodrik, D.,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559, 2017.

[3] [美]杰弗里·弗里登著,杨宇光等译:《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

逆转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大大增加了各国出口商、跨国公司、投资者和国际银行的机会，使得全球贸易和投资大量增加，在增进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帮助后发国家通过融入世界产业分工推动经济迅速增长和贫困人口的减少；但另一方面，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全球化也会成为破坏者，一个传统稳定有效秩序的解构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诠释和验证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它在推动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两个巨大的“负面遗产”，即全球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

其一，全球经济失衡。2003年，IMF第一次发出了全球经济失衡的警告，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之间已经出现令人担忧的贸易失衡，这种失衡将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极大隐患。但在随后的数年中，全球经济失衡并未得到有效缓解，相反，甚至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全球经济失衡不只助推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严重的是，它甚至可能诱发失衡贸易相关国家之间剧烈的冲突和对抗。戈莫里和鲍莫尔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们的研究表明，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通常会损坏他国的整体福利，国际贸易可能导致各贸易国之间的重大利益冲突。他们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决定一国福利水平的因素有两个：“蛋糕”的大小和所占的份额。因此，国与国之间既相互依赖（一起把蛋糕做大），又彼此冲突（谁能获得更高的份额）；对一国的最优均衡对于伙伴国而言则可能并非如此。贸易双方的损益往往取决于贸易伙伴的构成与选择。戈莫里和鲍莫尔阐述了国际贸易从共赢到冲突的动态变化的逻辑：在两国模型中当一国所占份额超过70%，而另一国所占份额不足30%的时候，贸易大国降低份额，将有助于总体贸易利得的提升，此时即使其分得的份额较小，但仍然可能达成双赢的结果；但是当两国所占份额都处在30%~70%之间的时候，贸易伙伴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就会显著增加。^[1]这意味着，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其与守成大国的贸易关系，将大概率地从互惠变为冲突。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还是2018年以来的中美经贸摩擦，都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上述结论。

其二，国内经济失衡。在国内政策没有与时俱进的情况下，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也会带来国内经济的失衡，并对国内分配产生巨大影响。经典贸易理论模

[1][美]拉尔夫·戈莫里、[美]威廉·鲍莫尔著，文爽、乔羽译：《全球贸易与国家利益分配》，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15~28页。

型指出，在一个有两种商品和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中，各要素具有充分的部门间流动性，那么其中一种要素的所有者必然会因贸易开放而受到损害。正是沿着上述理论逻辑，皮凯蒂通过对资本回报率（ r ）与经济增长率（ g ）的比较，证明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背景下不加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导致了一国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形成与扩大。他的统计分析显示，资本回报率往往高于经济增长率，但普通人的工资收入增速通常与GDP增长率保持同步。因此，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不断扩大。^[1]

（二）全球化最终成了国内问题产生的全部根源

不加管理的自由贸易会导致国家之间的经济失衡。如果贸易带来的再分配问题与不公平贸易挂钩时，反全球主义者的相关口号如汇率操纵、国有企业、政府补贴、产权问题等，就会极具煽动性，更容易诱导本国民众对于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抵制。换句话说，大众反对的不是不平等本身，而是认为自己在贸易过程中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贸易战的根本理由就是，中国在两国贸易中占了美国的便宜。而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中国采取的不公平的产业和贸易政策导致了美国长期持续的贸易失衡和国内产业工人的失业。

关于上述观点，2017年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一项实验为上述论断提供了支持。^[2]假设甲乙二人拥有两家互相竞争的公司。在每一场比赛中，甲都超过了乙，导致乙和他的员工失去了工作。在这一假设下，作者给参与实验者提出问题，让他们对下面的四种情景表达自己的感受：1）甲努力工作，进行大量储蓄和投资，开发新技术和产品，最终导致乙的失败；2）甲在德国找到了一个更便宜（或更高质量）的供应商；3）甲依靠孟加拉国的一家供应商提供外包服务，该供应商在每天12小时的轮班制和危险的工作环境下雇佣工人；4）甲以临时合同的形式将孟加拉国工人带到美国，并让他们在违反国内劳工、环境和安全法的条件下工作。实验的结果表明，尽管在每种情景下甲均造成了乙的失败，但实验参与者对每种情景的反应迥异。很少有人对情景（1）或情景（2）有异议，这些情景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市场结果。但是，他们对情景（3）和（4）的反应却非常负面，认为是不公平的，必须予以阻止。这一研究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民众基础。

[1][法]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1~28页。

[2] Christina, S., Mark S. and Paul B., "Why People Prefer Unequal Societie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1: 1-7, April 2017.

在这种情况下，公平贸易就往往会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护身符，全球化也成为了一种方便的“替罪羊”。发达国家国内的全球化失意者往往认为自身的失利并不是由于他们在市场竞争中运气不好，而是因为全球化的规则以及贸易伙伴的不公平的政策导致的结果，因此全球化成了他们集中攻击的对象。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那些民粹主义政客可以轻松地将可识别的外国人——中国人或墨西哥人——作为问题的根源，同时也可更加容易地根据收入/社会阶层、我们/他们的划分而进行社会动员，全球化于是进一步被具化为对“外国人”的攻击。

（三）全球化管理与国际秩序转型的未来

在国际秩序进入“大转型”的历史阶段，由于全球化被赋予了太多内涵和功能，如何有效地管理好全球化并使其发挥出更为积极的作用，就将关系国际秩序的转型能否顺利实现。在经济学领域，许多学者——从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到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从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到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进行的研究均指出了当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范式的弊端，并针对国际与国内的双重困境提出了极具思想性的方案，如更大程度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更加重视收入分配公平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同时着重指出过多、不受约束的国际竞争可能会对一国经济增长构成抑制作用。然而，由于全球秩序已经遭到系统性破坏，重构之路无疑会变得异常艰难。仅从当前世界的动荡程度看，不同的国家对于是否需要继续拥抱全球化或者如何管理全球化、国际秩序是否需要转型或者如何转型这些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来自新兴国家的民众希望摆脱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获得与本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话语权；来自发达国家的民众则希望能通过政策调整靠所谓“公平贸易”扭转国内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罗德里克等人提出的有管理的全球化下的政策调整方案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就成为全球化能否继续向前、国际秩序转型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为了达成这一点，无疑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充分的讨论和相互之间的谅解，其中世界性大国的选择将成为决定性因素。

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必由之路：推进世界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一）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约束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继续前行的捍卫者和有力推动

者。过去四十年，中国正是通过改革开放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启了不断创造经济奇迹的进程。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稳居全球第二，正在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全球范围内，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尤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都超过了30%。

然而，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又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担忧。在部分民粹主义精英和西方媒体的鼓噪下，中国成了发达国家失业增加、工人工资和福利下降的始作俑者，而以戴维·奥特尔（David Autor）和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以及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等人为代表的有关“中国冲击”的一系列实证研究结论，以及全球新冠疫情冲击下由于全球价值链断裂而对欧美发达国家经济造成的沉重打击，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恐惧。^[1]尽管有关发达国家国内社会危机的原因是多元、复杂的，但最后却被过度简单化为对全球化的指责和反抗，中国则成为了主要的声讨对象。

上述国际环境的变化无疑构成了中国新时代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的外部约束。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传统的发展道路已不再适用，否则可能遭受更多来自他国的指责和攻击，从而拖累中国发展的脚步。为实现百年复兴之大计，必须对全球秩序转型有更深刻的把握，才能够在不确定的全球秩序变化中尽力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一种宽松的外部环境。

（二）中国经济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新理念、新对策和新路径

在当前背景下，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核心是加快构建生产与消费更加均衡、进口与出口更加平衡、市场机制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加规范的高质量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在全球秩序重构进程中塑造一个更负责任的新型大国形象。这既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需要，同时也是营造更加和谐的外部环境、推

[1] 奥特尔等人的研究显示，1990—2007年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导致了美国进口竞争制造业部门的失业增加，参与率的减少和工人工资的下降。参见David, H. A., David D. and Gordon H. H.,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2121–2168, 2013; 以及David, H. A., David D. and Gordon H. H., “The China Shock: Learning from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906, 2013; 2014年阿西莫格鲁也加入上述研究团队，他们的合作研究进一步显示，由于来自中国的进口增加，1999—2011年美国的就业岗位在制造业减少了98.5万个，在全部产业减少了200万~240万个。参见Acemoglu, D., David H. A., David D. and Gordon H. H., “Import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US Employment Sag of the 2000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4:148–191, 2016.

动经济全球化回到正常轨道的需要。

1. 发展目标与理念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倡议,随后在2017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更加具体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在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风云激荡之际,这一倡议无疑指明了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并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共识,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尤其是在疫情肆虐之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意义更加彰显,唯有团结协作才能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挑战。但如何与世界各国人民合作践行这一倡议,还需要更加系统地诠释和深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并努力将其具化为一种可行的、具有更强操作性的发展纲领和行动指南。

2. 现实定位与政策调整方向

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时期,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主动融入世界经济,是一种后发国家顺应时代潮流自觉的道路选择,也是一种后发大国借助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全球体系中实现从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的身份转变的过程。在此阶段,中国是全球体系的跟随者和国际规则的适应者,相关政策更多考虑的是本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对他国的溢出效应则处于从属地位。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中国不但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甚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发动机,已经成为世界120多个国家或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尽管从人均GDP的角度看,中国依然归属发展中国家行列。但同时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发展中大国,一举一动已经能够给全世界带来非同寻常的影响。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正在与日俱增。中国的现实定位需要在历史发展阶段和客观国际影响两者之间努力寻找一种动态的平衡,即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同时,相关政策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对他国的影响,尤其是对贸易伙伴国的国内分配的潜在冲击,以此努力推进国家之间以及各国内部的包容性增长。

具体而言,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要求中国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实现发展理念的转变。一是从更重视国家整体利益向同时关心国家整体利益和社会与个人利益的转变;二是从更注重经济增长向同时关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转变。不但要关注国家与国家的整体利益平衡,还要关心国家内部的群体利益的公平分配。当前

国内有关中美贸易战的争论，无论是“如何打赢贸易战”的讨论，还是认为“中美贸易战是我国改革再出发难得机遇”的观点，大多基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增长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叙事逻辑，构成各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分配问题则被严重忽视，而这恰恰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裂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中美贸易摩擦固然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仇外行为，但仍然要注意到其背后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基础。比如部分底层民众在受到贸易战较大影响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忍受暂时痛苦而支持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为他们相信长期终将获益。^[1]因此，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化时代，作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中国在制定本国政策时，除了重视国内效果，还需要尽可能地关注其所可能产生的广泛的国际后果。否则，即使在贸易伙伴国由于自身问题陷入困境之时，中国仍然可能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从而反过来对中国国内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构成严重冲击。更具国际包容性的经济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贸易伙伴对中国模式的认同，逐步消解西方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的蔓延，推动经济全球化重回正常轨道。

3. 开放路径与国际协调（全球治理）

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体制差异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发展结果代表了全球秩序转型中的主要矛盾，也是亟待各方理性讨论、共同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自2017年12月12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WTO第11次部长级会议开始，围绕WTO改革，美日欧三方发布了七份与国际经贸规则相关的联合声明，试图构造规范所谓非市场经济体制扭曲的新一代多边经贸规则，其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此外，美国和欧盟还多次公开发表所谓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报告，指责中国没有兑现加入WTO时的承诺。从具体领域看，美欧等国家主要就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知识产权、技术补贴、强制技术转让、金融市场准入以及汇率改革等七个方面的问题对中国进行指责。上述问题交织和叠加在一起，就在整体上形塑了中国作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而成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和欧盟“体制竞争对手”的形象和地位。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只是激化了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和不信任感，因此，即使中国最先控制疫情并对各国施以人道主义援助，仍难得到发达国家的认同，相反，怀疑、责难甚至谩骂此起彼伏，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损害。

对上述问题的识别与评判构成了中国下一步改革和参与全球治理的重点。完

[1] Kotlowitz, A., “The Small-Town Cost of Donald Trump’s Trade Wars”, *The New Yorker*, December 20, 2018.

全满足美欧的要求将使中国丧失作为发展中国家应有的发展权，但继续坚持传统的自主性发展政策和产业政策而不考虑对他国经济利益的影响，显然也已不再可行。近几年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主动实施了多方面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不再仅仅专注于以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开放模式，而是更加聚焦于规则制度型开放，比如《外商投资法》的出台。

规则制度的重塑是中国防范化解与发达国家经贸摩擦、减少裂痕的重要一步。不过，从推动全球秩序顺利转型的角度看，仍需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上做出更大范围的自我调整。当前中国相关制度开放举措的受益者是发达国家国内具有竞争优势的全球性企业及相关参与者——他们原本就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但此类举措对于因内部失衡所导致的右翼民粹主义影响甚微，因此那些在与中国企业竞争中被市场淘汰的群体和行业也应该得到高度关切。需要考虑此类群体的失业或收入下降是否与中国产业政策存在一定的因果关联，如果有，又当如何调整才能在维护本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回应西方国家对国内弱势群体利益的关切。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最优选择就是采取更加透明的竞争中性原则，为双方健康而平等的竞争创造有利条件。短期来看，中国将会付出一些必要的代价，但长期将因此而获得一个更加宽松的国际环境。

最后，“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发起的开展区域与国际合作的宏大倡议，建设七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制度性公共产品，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携手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最佳实践。然而，国际上不和谐的声音（如债务陷阱论、新殖民主义等）一直不绝于耳。为确保倡议的顺利推进，需要直面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类质疑。为此，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发展应是下一阶段建设的重点。一是充分认清“一带一路”建设所具有的历史性、系统性、开放性、共赢性的特征。它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秉承开放原则，覆盖各领域的共同参与、共享成果的国际合作。因此，建设过程中中国要更加强调参与的广泛性，特别是大力推进“一带一路”的第三方合作，以此将“一带一路”打造成为区域乃至全球性的高质量高水平合作平台。二是要直面前期建设中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更加关注沿线国家的现实需求，重视项目建设与经贸合作对沿线国家普通百姓的福利提升作用，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惠及更多国家、更多百姓的共享式合作与发展平台，切实践行包容性发展理念。■

（责任编辑：崔秀梅）